

张元济、张树年父子长寿之诠释(下)

◆ 张琬

有一天，我无意中遇到一个老人对我说：若要身体好，只有一个字：“忙！”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说法，却充满了智慧，也许可以引用来说明祖父长寿之奥秘。我从出生之时起就看见祖父整天在忙。所谓“忙”，并非指忙于生活琐事或吃喝应酬，而是指他用毕生的精力完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乃至历史所肩负的责任。他对教育强国有着坚定的信念，对兴办文化教育事业有着执著的追求，对国家和民众的苦难有切肤的感受，对世界的发展有极大的关注。在一生有限的时间里，要实现这一系列的理想，能不忙吗？他是个脾气急、办事容不得半点马虎、坚持“今日事，今日毕”的人。所以他整日伏案工作，从没有一丝懈怠。他坚持60岁退休，实际上是退而不休，不仅致力于编校《百衲本二十四史》，且为商务印书馆的各项事务继续操劳。商务为他指派了一个联络员，每日上下午各来我家一次，把他写的书信文稿送出去，又把别人给他的书信带回来。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他每天要写出多少东西。先前的一个联络员杨福生老了，换了一个联络员叫汪志清，继续为他送信。到了晚年他中风卧床，而汪志清却继续来，因为他稍有恢复，就在床上支起小桌工作起来。与毛泽东数度通信谈国事，撰写《西藏解放歌》、《涵芬楼烬余书录》序，1956年致蒋介石劝其纳土归顺的信等等，都是他在床上的小桌上完成的。为了祝福我结婚，他赋诗两首，并亲笔在小桌上将两首诗写在红色洒金笺上。他还多次为尚在上中学的弟弟批改并批注作文。纵观《张元济年谱长编》，这个“忙”字一直伴随他到生命



张树年夫妇结婚七十五周年时合影

的终点。因为“忙”，所以他虽老犹对外界事物保持兴趣而没有产生老年人常有的那种疏离感；因为“忙”，所以他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因为“忙”，所以他身体的各个部件得以继续运转；因为“忙”，所以他脑力始终不衰退，而头脑是指挥身体各部分工作的中心。

父亲晚年有一次回忆起祖父时说：“他每天早上吃一大碗肉面，然后一天都在外面办事。身体是真好啊！”祖父一生精力充沛，他的勤奋非常人所能及。再加上前述的淡泊名利、生活简朴等因素，使得他深为我们晚辈景仰，也成为他长寿之奥秘。

父亲：在逆境中尽可能地找一些乐趣

父亲当年就读于美国教会在上海办的圣约翰大学，后又留学美国，获得纽约大学经济管理硕士学位，所以他是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在他身上兼有东西方文化的印记。他喜欢精细的生活方式，饮食方面欣

赏西式菜肴，早上吃西式早餐，下午喜欢来上一杯下午茶。他生性温良，不急不躁，儒雅谦和，生活非常有规律。在饮食方面懂得注意营养，荤素搭配。虽然喜欢美味佳肴，但十分有节制，从不会因为喜爱而多吃一口。一般来说，他喜欢比较丰富的早餐，而晚上则多半喝粥。这很符合现今中外营养专家们提倡的养生原则：“早上吃得像个国王，中午吃得像个王子，晚上吃得像个叫花子。”他每天坚持走路，锻炼身体。到了晚年仍保持这个习惯，往往独自外出散步。但是上海的马路十分拥挤，连人行道也被自行车占用了，以致有亲戚给我打电话说：“张伯伯那么大的年纪了，还独自在马路上走，多危险啊！”

父亲生活的时代和祖父有很大不同，不可能像祖父那样挥洒自如。从日寇入侵开始，家庭经济条件就日益困顿。他一直在银行工作，但是到了1949年之后，他所学的经济管理学属于西方经济制度的范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毫无用武之地的，因此他也只能在银行里当一名



张元济手书养生对联

普通的职员，拿着很低的工资，但他安于工作，没有怨言。到了“文革”时期，抄家是对全家人很大的打击。家庭经济条件一落千丈，居住面积也一再紧缩。幸好他生性达观，能以平常心对待这一系列厄运，并不因为家道的衰落而郁郁寡欢，而是在逆境中尽可能地找一些乐趣，例如看昆曲。他和母亲都热爱这个古老剧种。记得在三年困难时期，上海昆剧团常有演出，为了能买到好的座位，他和母亲会一大早带了小马扎出去排队，连早饭都顾不上吃。买到了前排的座位，晚上能看到精彩的折子戏，就是在那艰苦的日子里最亮丽

绝响：永远的邓丽君

姜捷



神来应付人潮，微笑、握手、签名、给照片，经常是弄到精疲力竭才罢休，观众的热情真让她又爱又怕。当然，受欢迎的滋味是任谁都不能抗拒的，在香港有件对邓丽君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第一个邓丽君歌迷俱乐部“香港青丽歌友会”的成立，这件事看来微不足道，日后的影响却很深。

1972年6月1日，“香港青丽之友会”成立之后，几乎是每半年一次，配合邓丽君到香港的日期做固定聚会。其中不少歌迷一眼就跟了她二十几年，到她逝世都没有离开过她。如今香港歌迷会成员已达数百位，最老的超过七十岁，最小的不过十四岁，平时定时行善，持续为她传播爱心。每年5月8日的怀念邓丽君之旅，他们组团来台湾，到金山的筠园陪陪邓丽君，为她亲手扎玫瑰花圈，在她的坟前点香祝祷，围在一起，轻轻地唱着她的歌。他们也非常照顾邓妈妈，陪着邓家兄弟的儿女们玩，感觉上就好像邓家的一分子一样。当歌迷可以到这样的地步，除非是这位偶像太好，让人从年轻爱到老，否则一时的“偶像情结”是很难维持这么久的。

当时的香港歌迷会会长张艳玲是个短发、大眼睛的女孩，和邓丽君同岁，打从十七岁起就迷上她的歌。邓丽君第一次来香港，在电视台播出她的专访时，更爱上她的纯真、善良。于是，她和几位男男女女的歌迷，大约有五六十人，大家喜欢的对象既然相同，就成立了“青丽歌友会”彼此联谊。“青”指青山，当时他是最帅、最红的男歌手，“丽”，当然就是邓丽君了，“青丽歌友会”其实只维持了两年，就自然而然地解散了。“青丽”虽然烟消云散，喜欢邓丽君的人却始终没有改变初衷，尤其是看到邓丽君数年来始终如一地为慈善公益活动尽心尽力，更决定要和她做一辈子的朋友！这群年轻的朋友就在1976年3月30日再度成立“香港邓丽君歌迷会”，每年定期和邓丽君聚会，他们会透过管道知道她来香港演唱的每一场时间。因为夜总会或歌厅的门票对一群穷学生而言，实在是太贵了，刚开始，他们从零用钱中一分一角地去存，存到满十五元才能进场，后来靠着关系可以走到后台听歌，才省下每次一定要看到邓丽君演唱的钱。

15.也许我可以帮你

“水小姐，你好，认识一下，我是你的主治医生，我叫习文，学习的习，文化的文。”习医生彬彬有礼自我介绍。“你就是那位在印度洋上漂流60多天靠吃生鱼、海鸟活下来的女士？”昨天上午院长特为同他谈过话，告诉他这位印度洋幸存者因受强烈精神刺激，患有反应性精神病，有一定的危险性，决定安置在6病区单人病房，由他负责。对这样一位有传奇意味的人，习文不免有些好奇心。“是的，”水波不卑不亢。“看不出。”习文赞叹，“习文微笑，‘水小姐，对不，我要纠正你这个说法。不是我们把你弄来这儿。’”“那是谁？”“是你们公司送你来这儿的。”“我们公司？”“对呀。”“我们公司凭什么将我送来，总有理由吧？”“这——”习文顿住，“公司认为你在印度洋60多天的漂流中，肉体和精神上都受到过度刺激，患有精神障碍，需要治疗。”

“精神障碍？”水波反问，“不错，在漂流过程中，由于死亡的威胁，由于极度的绝望、恐惧，我的精神确实受到很大刺激，几度想自杀。我想这不仅是我，换成你或其他任何人处在那样的情况下都会那样，你说不是吗？”“是的，”习文承认，“处在那样的情况下，包括我在内，我想任何人都那样。”

“对我这种闯过鬼门关，九死一生，精神上受过如此刺激的人理应给予真诚的爱护和关怀，如今不仅得不到，反而将我打成精神病人，关进精神病院。”

“水小姐，”习文加重语气，“我再讲一遍，这是你们公司的看法并以此为根据将你送来。”“那作为精神病医生，你的看法呢？你认为我患有精神病吗？”水波直视习文，目光炯炯。“我？”习文顿一下，“作为医生需要对你作一系列医学检查和检验，然后才能作出结论。”“那就查吧。”水波坦然。“请到我办公

室。”

“我父母、祖父母以及家族的人都没有精神病史。”水波讲了家庭情况。“好。”习文点头。“那你个人……”“啊！——”突然水波像被毒蛇咬似的猛地大叫一声，将习文吓一跳。“怎么啦？”习文惊问。

“你——你看。”水波指着桌边一份报纸，那是刚才一个护士送来的当天的《龙阳日报》，习文只顾提问填写病历，没在意。水波无意间瞥一眼看到了。习文拿起报纸，头版右上角一行大标题跳入眼帘：《印度洋幸存者水波因精神病人入院》。

“阴谋，这是阴谋。”水波忍不住吼叫。习文也觉得是个问题。昨晚水波才进医院，没经医院做任何检查，今天一早就登报，向社会宣布她是精神病人，联想起前天院长同他打招呼，说有这么多病人，要密切关注。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看来这些都是周密策划，而且涉及上层，不然院长不会听命，报纸也不会这么快就登报而且放在头版头条。他心里已经有了底，作为主治医生他必须慎重对待。

“你别激动，”他劝慰水波，“他们害你总是有原因的。如果你信任我，请告诉我，也许我可以帮你。”“你真能帮助我？”“我会做一个医生能做的。”

水波讲了“罗马人”沉没真相，以及她信守承诺，拒绝幸运收买、家中招窃以及报案被拒的经过。习文想不到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深为震惊：“你们老板这一手确实厉害毒辣。”水波点头：“幸运就是要封上我的嘴，我要出去。”“不行。”习文摇头，“进院容易出院难。”“啥叫进院容易出院难？”“就在我们病区，相距你房间不远的602室有一位中年女士，丈夫是老年，两年前病故，留下一笔房产。这位女士由于轻信和不善理财，受骗上当，损失了不少钱。她母亲认为她有神经病，将她送进医院。我们认为她有主观、偏激情绪，还有轻度更年期忧郁症，但还构不成精神分裂症。经过一段时间休养治疗，身体情况大为好转，情绪也平复，医院认为可以出院，她本人也很想出院，但是却出不院。”“为什么？”

印度洋的承诺

张士敏

